

不惟书不惟上 顺民意破陈规

勇于改革的省部级官员

丁东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，是一个人心思变、除旧布新、兴利除弊的关口。当时不只有中央最高层有一批立志改革的领导人，在省部级官员中，也出现了一些敢于从实际出发，突破陈规的杰出人物。

林乎加

回应考生上学要求 津京试办分校扩招

其一是林乎加，他在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。上任后，很多人向他反映，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，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，这些人进不了大学。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，把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，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，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。与会者说，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。林乎加问，有没有教师？他们说，有教师。林乎加说，可以招走读生嘛！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。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，大家态度都很积极，提了很多建议，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，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，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，由市政财政负担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，需要向教育部请示。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，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。林乎加认为，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。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



林乎加

归来，曾在天津住了两天，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。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，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，不能人尽其才。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，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，但教育部不太赞成。邓小平很快批示：这是好事情，国家财政又不拿钱，可以让他们试试嘛！得到批示后，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。依托已有的大学，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，扩招了8000名考生。

1978年10月，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。当时，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。和天津相比，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录取的考生更多，社会反映更强烈。于是，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，所有的人都赞成。接着，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。林乎加说，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，这对他们不公平。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。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。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。会后都表示，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，尽早把分校办起来。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，由各高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，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。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解决。市政府决定，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，有条件的局、办和大企业

也要尽量提供校舍。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，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，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。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，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。

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，到1979年2月开学，短短的三个月，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。1978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500分，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。16800名青年，在1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。就规模而言，北京市1978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。但历史已经证明，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。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，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，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。可惜，当时的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。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，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，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。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，但不利于营造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，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。

赵凡

解决知青返城问题 推动终结上山下乡

其二是赵凡，1978年任农林部副部长、农垦总局局长兼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。恢复高考以后，结束了高中生不能直升大学的禁锢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到强烈的质疑，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。然而，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，仍然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，规定今后边疆农场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。按照这一政策，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愿望就落空了。当时，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，城镇青年的就业完全由地方政府包下来，但许多大城市又拿不出这么多就业岗位。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，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，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，大出血死亡，引发了数千知青抬尸游行。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，失望的云南知青采取了更加激烈的举动。12月16日，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，下旬走到昆明火车站，不许登车，他们开始卧轨，阻拦火车。面对这一突发事件，中央在12月25日发给云南三条指示：一、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；二、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，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；三、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、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。同时，派赵凡飞往昆明，处理这一事件。

赵凡到达昆明以后，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。省里的干部说，这是知青造反，要出动公安解决。赵凡回答，中央没有这个精神。于是，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，由赵凡和云南省长、两个省委副书记及另一个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



赵凡



被誉为“知青之父”的赵凡

组成。他们和知青代表见了面。知青代表说，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。赵凡说，要把事实调查清楚，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。不仅要解决知青车站卧轨的问题，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。你们要体谅大局，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。接着，赵凡率调查组来到事态最严重的西双版纳。在农场，他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，有的住房都要倒了。当时，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3万知青罢工，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，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。赵凡参加革命几十年，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难题。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学诸葛亮，不能学张飞。他对农场的书记、场长们说，知青停工期间，工资也要发。

1979年1月8日，勐定农场知青绝食。赵凡连夜出发，驱车一夜一天，赶到勐定。10日上午，他和知青代表谈话，下午和广大知青见面。在农场招待所前边，跪了好几百知青，哭成一片。赵凡也哭了。他说：我来晚了！我也有孩子插队，我也是知青家长，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。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，两次被国民党抓住。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！你们先回去，这里晚上冷，冻出病来，把身体搞坏了，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。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。

赵凡不是用空话搪塞知青。他感到，必须调整政策。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，他对调查组负责人和农场负责人

讲，对于知青问题，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，但这次来调查，我的看法改变了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这一次要好起来，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。知青的要求很简单，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。云南的知青来自上海、北京、四川的比较多，赵凡就和这些地方商量怎么解决问题。四川省委的意见是，只要云南同意，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。但是，上海方面觉得有困难，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，他们有压力。

回到昆明，赵凡又和省委书记安平生商量。安平生说，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，云南省委也同意。于是，他们给中央打电报：在自愿的情况下，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，好好搞建设。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。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。上海、北京方面开始有担心，谈了几次，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。云南省委开了两次常委会，研究安排知青离开农场，办手续，分批走。1979年2-5月，云南农场知青的90%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。到1980年，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。知青返城大潮随后遍及全国。

1980年，中央书记处终于作出决定，从这一年暑假起，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，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。知青回城以后，就业又成了问题，这又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消失多年的个体私营经济。

林乎加、赵凡不是惟书惟上，而是从实际出发，开拓新局。他们推动实施的举措，完全是顺应民意，而不是借改革之名，行盘剥百姓之实。正因为有他们的敢闯敢试，才有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。（转载自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

李肇星当选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

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，中国外交部前部长、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肇星当选为会长。刘震摄

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在大陆巡展

星云大师“一笔字书法展”2013中国大陆巡回展首展日前在海南省开幕，共展出了星云大师书法作品55件。下图为星云大师现场挥毫。骆云飞摄（中新社发）



李行

两岸电影交流第一人

柳秀文

龙年岁尾，在中国影协和台湾著名导演、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行的共同努力下，已在北京举办了六届的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第一次走向海峡对岸，在台湾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式及相关活动，又移师北京完美收官。

率团实现破冰之旅

时光回溯到1990年。当时，有感于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，隔绝了40年的两岸电影人都有了了解彼此的心愿。中国电影家协会顺势而为，成立了台港电影研究会，准备邀请台湾电影人访问大陆。经专家介绍，正式邀请人选锁定为台湾著名导演李行。

李行的祖籍是江苏武进，1930年生于上海，童年在西安度过，19岁到了台湾。上世纪50年代涉足影坛，至80年代共导演作品50余部，是台湾“健康写实主义”电影的开创者和台湾电影近



谢晋(右)生前与李行情同兄弟。

半个世纪的见证人。有学者把他和大陆的谢晋称为华语影坛的双子星座。其《街头巷尾》、《养鸭人家》、《哑女情深》、《吾土吾民》、《汪洋中的一条船》、《小城故事》、《早安台北》、《原乡人》等影片多次荣获台湾金马奖和国际电影奖项。其时《汪洋中的一条船》正在大陆火爆上映。因此，李行成了台湾电影人正式访问大陆、实现零突破的最合适人选。

1990年10月12日下午，以台湾电影导演协会理事长、“金马奖”执行委员会主席李行为团长的台湾电影代表团一行8人终于跨海过海峡，抵达北京。在盛大的欢迎酒会上，李行讲的第一句话就是“回家的感觉真好”。

在北京期间，他们参观了北京电影制片厂，拜会了电影局领导，参加了“台湾电影观摩座谈会”，国台办有关领导还出面宴请了他们。然后代表团又去西安和上海“寻根”。在西安，李行郑重地对负责接待的原中国影协秘书长张思海说，本来我想到国民党中影公司做总经理，现在不去了，有生之年我就做两岸电影交流工作。

弃官推动两岸交流

回到台湾后，李行果然一诺千金。本着“交流就要你来我往”的初衷，他利用自己“金马奖主席”和“台湾导

演协会理事长”的身份，为大陆电影人出席“金马奖”积极奔走斡旋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大陆电影人几经周折不能成行。李行也受了不少磨难和委屈。转机出现在1992年，在李行的艰苦努力下，四批影人先后踏上了台湾的土地。用著名剧作家苏叔阳的话说：“我们是踏着李行的脊背跨过海峡的。”而以谢晋为团长的“大陆电影代表团”由于影响大，被两岸媒体认定是大陆电影代表团第一次正式访问台湾，入选1992年十大影事之一。对于谢晋访台，李行后来回忆：谢晋到了台湾，我请他看我导演的《唐山过台湾》，他看完后很兴奋地说：“李行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电影的片头字幕把导演名字换成谢晋，我的《芙蓉镇》导演换成李行，那根本分不清。”

“金鸡”“金马”合作良好

今天，大陆的“金鸡百花电影节”和台湾的“金马奖”已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双方每年都互派代表出席相应活动。几乎每年金鸡百花电影节李行都带团出席，每年电影节的台湾影展，也都要请他介绍和推荐影片。

在中国电影诞生百年前夕，他提出了“大中国电影史”的理念，于是一部由三地电影人齐心协力共同编著的《中国电影史》正式出版。

2009年起，他又开拓了一个新项目，每年在两地举行海峡两岸优秀电影展影活动，迄今连续举办了四届。



《摄影大师陈复礼》在香港出版

《摄影大师陈复礼》特刊日前在香港举行发行仪式。已届96岁高龄的陈复礼（右坐）先生亲自到场主礼（上图）。陈复礼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摄影大师，与吴印咸先生、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“华夏三老”。他有200多件作品在国际摄影沙龙获奖。任海霞摄

马云周星驰“巅峰对话”笑料足

阿里巴巴集团主席、首席执行官马云（左）和著名导演周星驰日前现身中国传媒大学，带着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跨界”巅峰对话。两人在现场笑料不断，马云还兴起教周星驰秀了一段太极功夫（左上图）。李学仕摄

名人遍地 大师难觅

桑林峰

近日，随着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屠守锷、著名气象学家陶诗言的相继辞世，大师，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字眼，又一次引发热议。

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当下，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，一个人往往依靠一首歌、一部电影、一篇文章、一个事件，就一举成名。但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感到，名人遍地，大师难觅！

在人们心中，大师往往博古通今，学贯中西，德才学识兼备。他们是灵魂守护者，是专业卓越者，是道德引领者，是文化传承者。名人重出名，大师则重学术；名人显于“器”，大师则显于“道”；名人影响一时，大师则影响一世，甚至数世。一个时代越文明，越发达，越进步，越应该产生更多的大师。

事实上，社会不是缺少大师，而是缺少成就大师的风范和品格。一些人“学而优则仕”、“成于名则商”，无暇也无意“坐冷板凳”、“写真文章”。一些专家教授为追名逐利行割窃之风，一些文化名人被商家绑架出卖理想，一些普通人秀出之后就丢掉本色。这样的人，被物欲蒙蔽了远眺的双眼，被功利阻碍了奋发的脚步，被世俗遮蔽了纯洁的心灵，当然也就不具备成就大师的特质。相反，只有那些有远大理想抱负，遗世独立、横而不流，为而不有、敢于担当，心无旁骛、埋头苦干的人，才无愧大师的称号。

如果说名人是精品，大师则恒久不衰的经典。

大师总是胸怀理想，秉持坚定信念。1998年，“袁隆平品牌”经评估，认定其价值约为1000亿元人民币。而这一年，袁隆平的月工资才1600元。但他依然心平如镜，过着朴素无华的生活，坐冷板凳搞研究，卷着裤腿下田，执著追求水稻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。

大师总能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。著名翻译家、作家杨绛先生新作出版后，出版社准备召开作品研讨会，她谢绝出席。赞她是著名作家，她说，“没有这份野心”。称她的作品畅销，她说，“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”。她唯一要求的是多留给她时间写作。

大师总是把自己放在低处，把灵魂放在高处。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、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先生，一生低调。她86岁时，还坚持每月几次到高能物理所上班，晚了就从食堂买几个包子、馒头回去吃。家住中关村，所里要派车接送，但她坚持挤公交，从不计较物质条件。

大师，不朽之名誉，独存于美德中。“但看古来盛名下，终日坎壈缠其身”。杜甫这句名言告诫人们，追名逐利难成大师，心浮气躁难立大业，好高骛远难有作为。唯有那些坚守理想、钟情事业，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的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。